

雷朴实 吴敬琏 编



#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O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LEIPUSHI  
WUJINGLIAN



经济科学出版社

#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美国阿登豪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雷朴实 编  
吴敬琏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BRUCE. L REYNOLDS E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ume II, Number 3, September 1987  
ACADEMIC PRESS INC.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美国阿登豪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雷朴实 吴敬琏 编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遵化县胶印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0.25印张 24 0000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ISBN 7-5058-0142-2/F·119 定价：3.20元

# 中文版说明

八年来在中国全国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为了总结和展望中国改革的进程，美国比较经济学会和联合学院1986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的阿登豪斯会议中心，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研讨会。这是一次有众多杰出学者参加的高质量会议。会上提出的论文经过修订以后发表在《比较经济杂志》1987年9月号上，然后汇编成书出版。为使我国广大读者能够了解和利用这次会议的成果，特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本书的翻译、编校和出版，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几位年轻的研究工作者承担了繁重的翻译任务，特别是由于经济科学出版社范国鹰和王林富有成效的工作，才得以完成的。美国福特基金会还为它提供了资助。我谨代表本书的两位编者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之意。

本书中文版是根据《比较经济杂志》1987年9月号进行翻译的；书中收入的五篇中国学者的论文，用的是它们的中文原稿，其中有的以英文版为准做了某些删节和结构上的调整，谨此说明。

吴敬琏

1987年12月20日

# 目 录

中文版说明	吴敬琏
前言	雷朴实 (布鲁斯·雷诺兹) (1)
中国工业中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 影响	威廉·A·伯德 (7)
中国工业中的双重价格体系问题	吴敬琏 赵人伟 (27)
中国货币和价格水平的确定	邹至庄 (42)
中国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反应: 改革进程的影响	巴里·诺顿 (63)
中国的货币和消费品市场	理查德·波蒂斯 阿妮塔·桑托拉姆 (89)
中国农业结构改革中的问题	托马斯·B·威恩斯 (116)
计划与市场: 毛泽东之后中国地方政 府的作用	黄佩华 (134)
中国的银行体系: 现状与改革问题	周小川 朱利 (155)
中国经济改革: 比较角度的透视	贝拉·巴拉萨 (167)
中印两国的经济自由化: 问题以及分 析框架	T·N·斯里尼瓦桑 (192)
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	艾尔玛·阿德尔曼 戴维·森丁 (216)
改革: 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陈一谔 王小强 (243)

中国改革后的贸易、就业和收入不平 等问题.....	雷朴实	(265)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总体改革合理顺序 的尝试性方案.....	费景汉 雷朴实	(282)
搞活国营大型企业的内部动力何在? ..	马 宾 洪君彦	(299)
股份制: 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	徐景安	(30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阿登豪斯国际 研讨会参加者名单.....		(313)

# 前 言

雷 朴 实

(美国 联合学院)

跟东欧和苏联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已开始探讨经济改革问题，薛暮桥、孙冶方等人的著述表明了这一点。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使得这种关于改革的争论被压了下来，默默无声了。但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改革很快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改革问题形成了政治上的一致意见，1979年年中，国务院开始下达第一批关于改革的政策文件。如今在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8年后，已有可能对这场改革做一次广泛的回顾和评价了。

为了进行这样一次评述，由美国比较经济制度学会和联合学院主办，并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32位学者于1986年10月在纽约州哈里曼的阿登豪斯会议中心聚集一堂。与会者有一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代表了国务院的两个研究单位（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另一半与会者中有12个美国人和4个欧洲人。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经过三天的会议讨论后又做了少许修改，现汇集成册，即为这本专题论

文集。

经济改革可以从体制改变的角度来加以定义——计划过程的改变，例如大大增加工业企业在确定本企业生产计划方面的决定权；或控制收入分配的一些制度的改变。因为改革这个词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所以，改革包括了种种体制上的改变，这些改变的实际影响，就是使中央在经济活动细节方面的决策权比过去减少了。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改革还往往不太严格地用来表示市场机制的引入。从这些标准来看，1978年以来，改革已遍及整个中国经济。

还可以给改革下另一种定义：改革是这样一种体制改变进程，其宗旨是增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速度。这种定义角度的焦点不在于改革的机制，而在于改革者所提出来的奋斗目标。在一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是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在计划经济国家，这个比率明显较低。在中国，改革以前最能说明问题的单项统计指标是：在1952—1975年，全要素生产率至多是停滞不前，而且非常可能是以大约0.5%的年利率下降。面对这种现象，维持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率是困难的；人们诊断，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过分集中，这种认识点燃了改革者的热情。

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在农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在工业方面则有令人不快的失败。在农业方面，尽管土地和劳动收入的增加微不足道，投资还急剧下降了，但产出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了。在工业方面，产出的增长率是高的，但资本存量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也是高的。1978年以后的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呈急剧下降。在中国的大约9万个国有企业中，特别是在传统上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8000个大型企业中，改革使它们在运营方式上出现一些重要变化，但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



到。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提出要全力以赴搞好城市的经济改革。

为什么工业的改革没有达到目的呢？为了求得某种解释，考虑到以下四个不同的因素对于分析问题是有益的，任何经济体制——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包括这四个因素：决策权、信息、动力和约束。任何一种进行经济决策的体制都必须明确谁握有决策权，都必须向决策者们提供关于资源稀缺情况的信息，都必须激励决策者们去采取行动，同时限制他们过分膨胀。在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源稀缺情况的信息是市场产生的，并通过价格加以传递。通过利率表现出来的货币限制，约束着过分膨胀。并且，私有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决策权和动力的问题：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做出有关资源配置的种种决策，有效的决策会给他带来报偿。

尽管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这四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会造成市场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持续提高。中国人在通过改革了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制重现市场经济的上述结果的尝试中，已经成功地进行了试验：利用市场价格去告知生产者有关资源稀缺的状况。把利润跟收入挂钩，有效地促进企业去增加产出，不过并没有促使它们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与此同时，1979—1980年和1984—1985年进一步分散决策权的努力，造成了由于无限制的扩张而形成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宏观经济不稳。

这16篇论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改革经验。第一部分的5篇论文分析了改革了的价格体制和宏观经济运行机制。伯德的论文以及吴敬琏和赵人伟的论文分析了中国工业的双重定价制度，根据这种制度，诸如钢铁、煤炭、卡车这类重要工业品有很大一部分被允许进入自由市场出售，那里的价格要比这些商品的国家计划调拨价格高得多。这两篇论文都说明了，中国运用这种

新形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就存在计划外价格的长期历史；并且这两篇文章都认为，这种双重定价制度是不稳定的，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伯德强调这种制度在造成生产者有效行为方面的好处，因为市场产生的价格决定着生产者们的边际决策，这些价格尽管占有的“市场”份额小，但它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吴敬琏和赵人伟则强调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缺点，特别表现在非法套利活动和低效的小型生产者的增长上。

第一部分的另外三篇论文谈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诺顿提出了一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他估计出1957—1978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函数，他发现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在1978年以后这个时期，诺顿追踪了货币收入和政府赤字的迅速增长，并得出这样令人吃惊的结论：中国的居民和企业通过储蓄的自愿增加而弥补了政府部门的收支失衡。这部分的另外两篇论文用截然相反的方法去建立“有计划的宏观经济”模型。邹至庄的论文表明，一些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很适宜分析这种经济；实际上，他所估计的价格水平、货币供应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为稳定。波蒂斯和桑托拉姆利用非均衡宏观经济学方法得到了一些可比的结果。

第二部分包括威恩斯、黄佩华、周小川和朱利、巴拉萨、斯里尼瓦桑提出的论文，属于部门研究和跨国研究。威恩斯的论文提醒我们，中国农业的改革还有很多路要走。黄佩华的论文阐明了：地方政府在工业领域的重要作用是经济变革的一大障碍。中国的银行体系作为进行货币控制的一种有效工具尚存在的种种缺陷，是周小川和朱利所论述的内容。巴拉萨和斯里尼瓦桑分别把中国的改革与匈牙利和印度的经验做了比较分析，由此产生的政策内涵

第三部分的论文谈的是改革的影响。阿德尔曼和森丁发现，

1978—1983年，中国农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扩大，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中国总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了明显缓和。陈一浴等人的论文报告了1985年一次对工业改革进行的广泛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这次调查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牵头的。这篇报告展示了改革的种种明显成果，但也表现出对通货膨胀压力和不合理的投资分配的关切。雷朴实利用世界银行编制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证明了这一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1981—1985年间发生了变化，转向了“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向。

第四部分论文探讨的是工业企业所有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极端，徐景安认为，实行股份制将会解决工业改革中许多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这是迫切的需要。在另一个极端，马宾和洪君彦则认为，工资品对于调动工业劳动者的积极性能提供充分的刺激；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不宜建立私人资本市场。费景汉和雷朴实持中间立场，他们认为，开放资本市场对于形成改革了的经济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这种变革只能逐步实行，并且要随着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更为广泛的变化而进行。

近几个月来，人们看到中国的改革遭到一些明显的挫折。这些论文就中国改革的未来说了些什么呢？埃维塞·多马做过这样的评论：与那些追求生产性提高的个人所做出的千百万个小决策的净效应相比较，技术变革的效应不会比它更大。但是，从个人是关键因素这个角度进行的分析，向社会主义改革者提出的，既有技术性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怎样赋予个人权力并推动他去有效地从事生产活动呢？怎样才能以一种高度政治化的银行体系中，以间接的货币限制来取代直接控制呢？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强调个人获益这种倾向相一致呢？

这都是一些难题。但是，这本专题论文集中的所有论文共同

的主题是：中国具有找到独到的解决办法，如生产责任制、价格的双轨制等等的才能。这种创新精神、实用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障碍的愿望，反映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这种对于民族和文化主体的自觉使中国确信，它能够阐明和创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范国鹰 译）

# 中国工业中实行计划与市场 双轨制的影响<sup>①</sup>

威廉·A·伯德

(世界银行)

本文试图以充实的理由来说明，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处在这样一种进程之中，即朝着产品的分配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而不由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性控制来决定。本文还要大致分析一下，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在资源配置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本文研究的主题将限定在工业品(主要是生产资料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农业来说可能甚至更为适用。本文首先探讨70年代后期在中国工业中出现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起源和发展。随后将分析这种体制的静态和动态影响，特别是动态影响。最后我们还要就这种体制在80年代的一些实际发展予以简要的评述，主要以煤炭、卡车、水泥和钢铁产品等的实例分析来进行。

---

<sup>①</sup> 凡本文中的观点、新发现、论述和结论，都由作者负责，与世界银行及其所属机构没有关连。本文从世界银行研究项目673—14号的部分材料中获益良多。作者在这里还要对亚诺什·科尔内、贝拉·巴拉萨、雷朴实和其他一些参加研讨会的学者给予本文的评论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一、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起源和发展

计划与市场可以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相结合。一部分商品可由计划来配置，而另一部分商品则由市场来配置。计划与市场的分界线也可根据企业来划分：一部分企业的投入和产出由计划来控制；而另一部分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则由市场来支配。另一可供选择的结合方式是，计划和市场的分界线是把一些特定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一分为二”，即实行每种投入和产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中有一部分由计划控制，而另一部分则归市场调节。这后一种办法是最普遍的，也是与中国目前的实践最为相近的。

按照规定，在双轨制下，每个企业都面对着一组向量，包括计划产出指标、产出品计划调拨和投入品的分配指标、投入品的采购、生产以及按照可变价格通过市场销售的超计划产品等等。所有形式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的计划调拨和供给品的行政性分配，都包容在“计划”部分；而市场性部分则是限定在以市场进行分配的部分。市场价格被假定为比计划价格高。

**双轨制在改革前的根源** 这些根源包括：（1）以成本为基础对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的多重定价作法；（2）多重的计划和供给渠道；（3）市场知识浅薄和类似于市场的活动不发达。所有这些都是与文化大革命中分散的和自给自足的工业化政策相关的。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是高成本的小型工厂大量出现。它们与50年代以及后来建成的由中央或省管辖的大型企业相并存。

双轨制在改革前的这些根源显然是受到种种限制的。首先，

---

1. 参见黄佩华《中国工业中的所有制与管理：毛泽东主义的遗产与80年代的展望》（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证词），收入《2000年中国经济的展望》丛书的第1卷《四个现代化》，美国政府印刷局，1986年版第57-58页。

价格处在行政性控制之下，即使这种价格控制是由较低级别的政府机构来实施的，其定价工作的呆板生硬与中央政府的作法毫无二致。其次，商品的流动由地方政府管辖，甚至于交易者通常都是政府单位，而不是企业。最后，在改革前，类似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渠道在总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一直很小。但是，改革前的实践为后来双轨制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可能和出发点。

**对买方市场和对卖方市场适应的格局** 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之间，价格压力和价格调节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sup>①</sup>在买方市场中，所有有关商品供给的价格都承受着下跌的压力。买主并不必接受由计划进行分配的高价商品，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那些商品。在这种局面下，发展趋势就是计划崩溃，代之以由市场配置资源和确定价格。<sup>②</sup>

在长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市场导向的改革，会强化业已存在的价格上涨的压力。这种情况与现存体制相互作用而造成双轨制，并使由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在边际发挥作用。在卖方市场中，得到计划分配物资的用户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价格提高。但是，那些得不到计划分配物资的购买者和那些计划分配物资量不敷所需的厂家，愿意以市场价格购买他们不可能通过计划而得到的物资，当然，这种交易对卖方也是有利的。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趋势：总产出中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增量部分，要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已经存在的多重定价和分配体

---

① 参见伯德：《市场的作用及影响》，此文收入吉恩·蒂吉克和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工业改革》一书中，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62页。

② 对买方市场适应的格局在诸如手表、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清晰。参见伯德和蒂吉克：《重庆钟表公司的调整 and 改革》，载世界银行工作参考文件第652号：（1984）：《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两家工业企业的研究》。在1980—1981年，当调整政策产生出暂时的过渡供给后，在机械产品市场和一时在钢铁等基础工业产品市场上也出现了买方市场。

制有助于实现这种转变，因为市场只是在多种商品分配渠道中又增加了一种渠道而已。

对卖方市场的适应和对买方市场的适应的关键区别在于，在对卖方市场适应时，已有的多重配置和定价体制继续存在，并且通过形成一种附加的市场分配渠道而演进为双轨制。另一方面，一种强有力的买方市场则对所有有关供给品的价格施加降价的压力；往往要削弱这种多重分配和定价体制（如果它处于首要地位的话），<sup>①</sup>在那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双轨制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国家定价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用户就会拒绝购买计划调拨的投入物。

总而言之，自7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的双轨制，乃是在长期卖方市场环境下推行市场导向改革的一种结果。双轨制对市场力量的反应是，它提供了一个边际“安全阀”，它可以消解过度需求的某些压力，而又能为计划分配物资的购买者保持低计划价格。

**政府价格政策** 一系列的价格政策改革起到了促进双轨制的作用。<sup>②</sup>浮动价格实行较早，尽管除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产品之外，起初一般只是向下浮动。自70年代后期，议价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体现在消费品上。1985年初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全面解除对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sup>③</sup>由于这一改革使得市场调节部分脱离了价格限制，所以它标志着双轨制最终形成了。

---

① 对于许多消费品来说，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改革前并不存在多重定价体制。为了对消费课税而将消费品价格定得很高，以致最高成本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以成本为基础上的多重定价制也就没有必要了。

② 关于中国工业价格改革问题，C·H·蔡在他的《中国工业价格改革》一文中论述颇多，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许多这一方面的有用资料。该文是提交给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6年3月17日—20日举行的“中国体制改革讨论会”的论文。

③ 参见沈毓芳、韩德民：《1985年主要物资市场价格变动分析》，《物资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



## 二、双轨制的静态和动态影响

由于双轨制本身的形成,以及它影响到很大一部分工业产品,所以,它的内在趋势和动力就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格局和工业决策者们的行为。这反过来又对双轨制的环境和它随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静态影响** 如果所有的企业各种投入物的供给至少有一部分和各种产出品销售有一部分由市场调节,并且如果企业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在既定的企业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禀赋的条件下,将不仅会出现一种很有意义的短期均衡结果;而且这种均衡还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sup>①</sup>尽管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所需的设定条件在这里无疑并不十分完备,但却距离“近似”典型事实已不太远。从表1可以看出:大量的中国工业企业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至少已在从事某些市场交易(尽管并非是每个企业的每种投入和产出都参加了市场交易)。无论如何,对市场机制完全渗入所有企业和商品这一设定条件的较小偏离,不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企业即使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的目标函数,仍然会形成一种均衡状态,虽然这种均衡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sup>②</sup>

---

① 参见伯德:《市场机制与中国工业经济改革》一书的第六章。这本书是伯德198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提出的博士论文。

② 另外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企业目标函数,是受到利润和“资源”约束的产出最大化(参见鲍莫尔:《企业行为、价值和增长》,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奥维奇出版公司,1959年版;艾姆斯:《苏联经济进程》,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理查德·D·欧文出版公司,1965年版;波蒂斯《中央计划下的企业》,载《经济研究评论》第36卷第2期197—212页,1969年4月)。在这种情形下,计划目标和计划价格的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具有“收入效应”。伯德对于不同企业目标函数的长处进行了探讨(参见伯德:《市场机制与中国工业经济改革》一书的第五章)。有相当的例证表明,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在他们的决策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利润了(甚至不顾计划指标或数量最大化了)。